

时代精神与高峰文学作品

◇ 张清民

如何破解文学创作“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这一理论难题？笔者认为这一难题的解决取决于作家能否站在时代的精神前沿、精准理解和把握当下中国的“时代精神”。

一、什么样的社会精神才是“时代精神”

什么样的社会精神才是中国当下文学创作所需要的“时代精神”呢？笔者认为，“时代精神”在内涵上具有四个逻辑维度。

“时代精神”的内涵之一是“时代”。“时代”是人在时空存在中的时间维度。从时间维度考量，时代变迁会影响文学的内容和风貌。不过，“时代精神”中的“时代”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时间量度的概念，而是一个空间化的时间概念，其实际内涵包含时间（历史）与空间（社会）两种成分。这样说的理由在于：单纯的时间流逝并不会对文学发展造成什么特别的影响，影响文学变化的因素是时间序列（“时”“代”）中的“运”——社会生活的变化及其趋势。所以“时代精神”中的“时代”并不仅仅指某个“历史年代”“历史时段”这类单纯的时间单位，而是内蕴着社会生活状况（世情）的时空一体概念。“时代”概念的空间化还表现在，它常常与体现特定历史时期生产力水平的语词合用，用以描述一个时代的社会发展状况，比如“农耕时代”“后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全球化时代”这类概念。

“时代精神”的内涵之二是“精神”。“精神”是人在时空存在中的意识维度。在社会生活中，“精神”是指人在伦理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文风貌，“时代精神”因而是指一个时代国家和民族的人文状况、世道人心，诸如价值、理想、信念、伦理、道德、人性中的善恶美丑状况等等。“精神”之维在文学创作中至关重要，因为文学活动最不能够承受的就是生命活动中的“轻”——没有价值和意义的自然生存状态。

“时代精神”的内涵之三是“世界精神”。“世界精神”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世界精神（DerWeltgeist），而是现时代国际社会的主流文化精神，亦即以“自由”“民主”“公平”“法制”为核心的文化精神——这也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社会精神。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社会理念都是以“自由”“民主”“公平”“法制”为社会文明的核心，文学活动不能脱离这一意义上的“世界精神”。

如果跳出形式逻辑的思维，从辩证逻辑的角度考量，“时代精神”内涵中还应该包含“人文精神”及一个时代的社会走向与历史要求。“时代精神”中的时间之维固然决定了万物皆变、无物常驻，但万物在常变中也会有不变，比如人们对美好人性的渴望以及对人文关怀的需要，由于这一原因，以人的价值与尊严为目标的人文精神成为“时代精神”不变的追求。就现代民族国家的存在而言，“时代精神”只有在它能够体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诉求之时，才能得到这个国家民众的普遍认可和接受，因此这一概念必须内在地包含一个时代的社会走向与历史要求。

二、高峰作品需要什么样的“时代精神”

之所以强调“时代精神”在文学活动中的作用，是因为时代精神与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结构及精神水准相对应。文学作品所表达或隐含的“时代精神”就是作家对其所属时代的物质及精神生存状态所做的艺术化的叙事，是该时代国家经济、政治境况及社会伦理、道德、思想等集体意识的投影。文学作品所透视的时代精神的深度决定着文学作品在认识层面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与精神高度，在这种意义上，作家要创作出高峰文学作品，就必须对“时代精神”具有较深层次的理解和较高度度的把握。然而，就当下的社会语境而言，什么样的

“时代精神”才是符合生产高峰作品所需的社会精神呢?

(一)创作高峰文学作品,需要面向政治、不忘初心的人民精神

文学中的“时代精神”体现着作家的社会价值认同,包括社会政治认同。在“政治”一词的理解上,这里必须加以特别说明。在中国数千年的专制传统中,文人们常常把“政治”理解为“权力政治”或“权力者的政治”,在这种政治观的支配下,他们在创作时只会揣摩权力者的意图、图解统治者的有关政策。这种情况下的文学创作违背创作的基本规律,其作品要么沦为阿谀奉承性的颂圣之作,要么成为给统治阶级统治的合理性进行鼓吹的宣传品——高峰性质的文学作品当然与此类作品无缘。新中国政治不同于旧时代政治的地方,在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不是以统治人民而是以服务人民为目标。就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目标就是改善民生,让人民过上他们满意的日子,让人民实现最低限度的“中国梦”,这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政治。

对于作家来说,在文学创作中努力表现社会现实以及人民群众生存和生活的需要就是文学最大的政治目标。事实上,坚持人民立场和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优良的政治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文艺问题上不变的宗旨。从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习近平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文艺上的“人民立场”“人民文学”的宗旨一直没变,因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并要求作家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反映好人民心声”。作家要坚持“人民文学”的导向,就必须在心里时时刻刻想着人民的疾苦,不能让“人民”成为一个空无所指的政治符号,不能行事与人民的利益相抵触,却又在口头上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旗号,并且仅仅是以“人民”的名义。

(二)创作高峰文学作品,需要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

“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精髓是“写实”。“写实”

就是要直面充满了矛盾、差异乃至对立的社会现实,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倡导的现实主义文艺观。从目前的文学创作情况来看,许多文学作品脱离实际,胡编乱造,人民群众不爱看。要解决这一尴尬境况,作家在创作时必须面对生活中的客观事实,对生活中的光明面要热情讴歌,对生活中的矛盾、缺陷、错误、丑恶也要表现——遮蔽与回避生活中的假、恶、丑并不等于假、恶、丑不存在,更意味着矛盾和问题会自动消失。矛盾和问题的表现尺度大一些并无大碍,揭开矛盾和问题的盖子反倒有利于矛盾和问题的解决;不敢正视社会生活中的重大矛盾和问题,出了事一味捂着、盖着,只能使矛盾越积越大、问题越积越严重。高峰作品一定是敢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作品,也就是敢于真实反映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作品,一定是爱人民之所爱、憎人民之所憎的作品。

(三)创作高峰文学作品,需要无私无畏的批判精神

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品格之一,批评和自我批评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文学研究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就是在这种传统中提出的。实际上,通过文学对社会问题进行艺术化地批评,本是社会自我改进、自我增进活力的一种途径。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在执政过程中有问题决不怕批评,更不怕文学方面的批评。从历史上看,如果文学领域只有歌颂和遮蔽,高峰作品就永远无从产生。歌颂和遮蔽多、批评和揭露少是这些年文坛有高原少高峰的重要原因。为创作松绑,减少人为的桎梏和禁区,已成为创作高峰文学作品之所需。

目前的中国由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的调整及产业的换代升级,社会上出现了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还相当严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习近平同志才说“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正是看到了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之严重性,习近平同志才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有‘铁肩担道义’的社会责任感”、敢于“说真话”。从逻辑上说,如果文学作品不敢触及尖锐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那就证明“文运同国运”“文脉同国脉”没有“相牵”“相连”,证明作家是在回

避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不触及尖锐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则作家说的都是正确的废话、假话;在废话和假话充斥的文学作品中不可能产生高峰文学作品。想创作出高峰作品的作家,必须知道人民群众爱什么、恨什么、喜什么、忧什么。从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角度说,文学表现的对象越是复杂、越是接近真实的人性,则其对象的审美张力就越大,文学阐释的理论空间也就越广,文学作品的意义也就越加耐人咀嚼,如此才有希望走向艺术创作的高峰。

不能把“时代精神”理解为只包含“光明面”或“光明面”占压倒因素的社会精神,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仅是光明和前进,有时假、恶、丑的东西可能会成为社会的主流并甚嚣尘上。“时代精神”是各种矛盾的聚合体,不同矛盾对象间的对立、对抗和斗争,时代的卑微和猥琐、沉沦与堕落等,都应该在文学作品中得到艺术化地表现。

(四)创作高峰文学作品,需要国家的主流社会精神

从话语层面考量,任何国家的主流社会精神都必然是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镜像,作家在表现“时代精神”时,不管他本人自觉还是不自觉,其作品都必然会打上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烙印。在某种意义上,所谓“时代精神”就是一个时代的国家主流社会精神,也就是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当下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们构成了中国的主流社会精神,从而也是当下中国的“时代精神”。这一情形要求广大作家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必须“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根本任务”,把“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现代社会理念熔铸到作品的内容中去。

三、作家应当怎样去创作高峰作品

中华民族若要在世界上拥有话语权,就必须有足够的软实力,比如在文学领域多多产出一些震撼人心的精品之作——这是时代赋予作家的使命。作家若能把握时代机遇、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休戚与共,传神写照时代精神,则其作品必能开一代风气、收振聋发聩之功效,成为社会发展的精神晴雨表。作家在写作时如果无视时代的精神状况,则其作品无论如何精雕细琢,也必流入浅斟低唱之列,难以有

大格局、大气象。

作家怎样做才能够创作出具有高峰性质的作品呢?笔者认为,文学创作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作家的主体性状况,因为作家在文学作品所表现的“时代精神”是他本人所理解、所认识的“时代精神”,他怎样理解、怎样表现完全取决于他的思维深度和认识水平,因此每部具体的作品中所透露或展现的“时代精神”都是作家主观塑造和建构的结果;极端而言,每个作家所理解的“时代精神”在本质上都是他自己的精神。作家能否精准地理解和把握“时代精神”,取决于他是否具有下述几种意识。

(一)鲜明的时代意识

“时代意识”内含有两个维度:时间之维的当下性,现实之维的切身性。切身性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性,也就是作家个人所体验、理解了民众的切身性。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就是指文学创作应当面向自己时代人民的生存现实,积极关注现实生活、社会问题、大众愿望,面向国家建设和民族发展需要的现实。

在时间维度上,作家的“时代意识”绝不可局限于“当下”性的理解、认知,他必须放眼未来,拥有常人所不具备的超前意识,因为文学是“镜”更是“灯”——烛照国家和民族前行的明灯,它不仅“反映”“再现”现实的社会生活,更要“预言”“表现”未来的社会生活。从世界文学史的角度看,优秀的作家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先知先觉者,他们在看护自己时代的同时又常常超出自己的时代,成为未来社会的预言者。

(二)敏锐的政治意识

“政治意识”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政治目标意识。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她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让人民对执政党满意,就是当前中国最大的政治。在此意义上,“政治意识”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执政党认可程度、满意程度的意识。文学作品只有真实反映了这一意识,“时代精神”的现实之维才能得到凸显,文学作品的思想价值、从而其社会价值和政治价值等才算得到了实现。换言之,“政治意识”就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社会意识,而不是“权力意

识”。作家必须意识到,文学作品是作为艺术品写给艺术接受意义上的读者看的,而不是写给相关的权力者看的。作家如果只是两眼向上,那么他的作品一定没有长远的生命力,因为在艺术接受的意义上,就是职业的审查者也不会喜欢充满宣传语调的作品。

文学表现政治,不等于在作品中进行赤裸裸的政治宣传。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这个问题上旗帜鲜明地反对“席勒化”——文学作品的说教化,反对把文学作品变成时代精神的传声筒。当下的中国作家必须摆脱以文学为宣传和舆论工具的战争年代的思维模式,在认识和表达方面加以思维转型。

退一步说,即使利用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宣传,也要讲究宣传的策略和方式。提升艺术水平,把文学作品打造成艺术品牌、走出国门是宣传;把政治意图或宣传意图隐藏在叙事或形象之中、寓教于乐也是宣传。“文以载道”“文以明道”虽然是指文学作品可以传达思想(道),但那思想是融化在艺术叙事中的精神理念而不是直白说教的逻辑概念;即便文学作品所载之“道”关乎政治,那也只能是理念层的政治而不是政策层的政治。从辩证思维的角度说,不宣而宣,是为上等之宣、高级之宣。例如,《亮剑》《历史的天空》等优秀文学作品,虽然没有刻意进行政治宣传,但比起那些刻意宣传政治的作品,其社会效果要好上百倍、千倍。

(三) 强烈的批判意识

“文学批判”是指文学作品对社会生活中的假、恶、丑的对象进行艺术化地鞭挞。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永远都不会是完美的存在,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东西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对立而发展,艺术家的社会使命就是对社会生活中一切与人民为敌的丑恶对象开展批判和斗争,作家回避假、恶、丑的对象等于助纣为虐,最终也同他人一样要共同承担这问题的恶果。从当下中国的社会情况来看,鲁迅所批判的民族劣根性如奴性、冷漠、麻木、暴戾等仍然有不小的市场,近些年社会道德滑坡、伦理失范等问题十分严重,然而,在文坛上很少看到作家对这类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许多作家在创作时逃避现实,回避假、恶、丑,报喜不报忧。这种思维状况既是

明哲保身的传统文化基因的因袭,也是“隐恶扬善”的道德理想主义之果。道德理想主义的恶果就是历史虚无主义:作品的内容与社会现实不符,人物形象又拔得太高不近人情,结果谁也不想看,谁也不相信。

(四) 崭新的世界意识

“世界意识”也可以表述为“全球意识”或“国际意识”。在全球经济趋向一体化、文化趋向类同化的今天,由信息、经济的全球化带来的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渗、融合的趋势有增无减,国际环境以及中国的社情、国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旧有的文化观念进行文学创作常常会陷入方枘圆凿、龃龉难入的尴尬情形,无法在精神上引领人民的行动。在此情况下,作家应当有“世界大历史”的观念,在思维上超出传统的家国情怀,胸怀“世界”而不是胸怀“家国”,在视野、格局、境界上超出前代作家,怀抱“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在全球化时代,胸怀个人乃至胸怀“家国”的作家,其作品所呈现的“时代精神”在格局上必然是“小时代”;胸怀世界、胸怀天下,作家才能突破经验局限,在精神格局上呈现为全球环境下的“大时代”。高峰作品必然是书写“大时代”的作品,“大时代”之大不仅指作品在精神、思想上大气包举、震撼人心,也指作品所表现的民族文化、所包含的“时代精神”之大——不专属一个时代而属于永恒!

(五) 多元的包容意识

世界是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的混合体,因而不存在黑白分明的“时代精神”,更不存在单一维度的“时代精神”。社会生活中的事件并不都是正剧或喜剧,有时是悲剧,有时是丑剧,有时是闹剧。所以,文学创作不能也不应该回避假、恶、丑的对象,因为掩盖矛盾和问题不等于矛盾和问题不存在;把矛盾和问题的盖子掀起来,才能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和社会的进步。即以当前思想界的状况而言,“左”“中”“右”各种思想互相激荡,其中“左”“右”两派思想尖锐对立、势同水火,但从实质来看,双方的理论目标殊途同归:分歧双方的思考均因对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不满,都希望社会发展和进步,并没有一派希望中国变乱、变坏。就此而言,作家在描述这种现象时,

必须对不同立场持多元观念和包容态度——深刻的思想和认识往往来自于生活本身所具有的激烈矛盾和冲突,平静如水的生活不可能产生深刻的思想。从世界文学史的情况来看,越是矛盾和问题多的时代越容易出现高峰作品,各国文学史上都不乏此种例证。多元理念与包容意识源自人内心的强大和自信,目前中国在上从硬实力到软实力都在逐步提升,作家在社会观念、社会立场等方面的观察上没有理由不自信。

(六)形上的超越意识

超越意识就是超越日常功利需求、追求人类共同价值和终极意义的哲学意识。超越意识就是作家在创作目标上的“广度”“深度”“厚度”意识,因为它超越了经验因素的局限,跨越时代和种族,是终极意义上人人都得面临的生命意识,所以能够获得人类普遍的心理共鸣。之所以强调文学作品的超越意识,因为文学属于审美文化的类型,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标志,文学作品是展现一个民族文化高度与深度的精神窗口,文学名作也因此成为一个民族在世界文化领域里的精神名片。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但能给人们带来审美和娱乐,还能在人格教育、境界提升、文明陶冶、意义建构等文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也是人们说“文学是人学”的主要原因。只有多多产出建立在超越意识上的文学精品,文学才能在文化的意义上满足国内民众的需要,提升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形象。就文化内需来说,随着社会的

发展,中国的教育水平和文化水平在总体上有了较大规模的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学作品的品位和质量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习近平同志才要求作家“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就文化外推而言,“一带一路”中的文化倡议目标的实现,其根基是为相关国家的民众提供具有较高审美品位的文学精品,在美的形象与叙事当中给人们提供艺术层面的道德、伦理、意义、信仰、理想等人类共同价值的精神养料,从而使“时代精神”获得超时代的思想深度、精神厚度和意义广度。

作家在具备上述意识以后,能否精准把握时代精神、创作出具有上乘水平的高峰文学作品,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因为文学创作是一项极为复杂的艺术工程。要创作出高峰性质的文学作品,作家就必须具备比普通作家更多的付出、更强的能力、更大的胆略、更高的见识、更深的功力。当然,仅有主观因素还不够,再高明的创作者也需要创作上的客观条件,比如宽松、自由的思想、政治环境等。从历史上看,有时候这类客观因素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要远远超过作家创作时的主观因素。

作者简介:张清民,河南大学特聘教授,河南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自《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原文约13000字)